

Column

■知无不言

# 经济过热症结在土地收益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中央政府最近终于决定通过编制“国有资本预算”的方式,将国有资本收支尤其是收益情况统一掌握起来。这是一个重大进步,因为至少相比以前透明化了,更有助于社会的公平公正,因为预算的一个作用就是强化监督,使公众能够看到这些名义上属于大家所有的国有资本每年产生多少损益,又是如何处置的。

由此我在想,在一个主要由国有资本集中经营国民经济主要资源与骨干行业的环境中,相比于主要由私人资本经营的情况,其经济运行特点,特别是宏观调控的重点与方式,想必是不完全相同的。起码,行政性垄断就是一个突出特点。而行政性垄断的背后是政府,拿但以私人资本为主的经济体系中积累形成的宏观经济理论工具,来认识分析行政性色彩较浓的经济运行,甚至在政府干预的实践中把入家的“宏观调控工具”直接拿来,调控效果难尽如人意是毫不奇怪的。

等到第一份中国“国有资本预算”公布时,我们就会切实看到国有资本规模的庞大及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既然政府是经济中的主要力量,政府又是行政的身,那么,当经济运行出现了类似眼下的“偏向可能转向过热”、通货膨胀压力快速扩大之时,中央宏观调控的主要着力点应是什么?应主要靠行政措施还是市场化手段?学者与官员们的解释能够完全从流行于欧美大学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寻找理论基础吗?

依我看,在我国整体经济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宏观调控的重点绝不是非政府力量掌控的私人资本活动,而应该是各级政府及其延伸力量的国有资本。因为这些力量掌控着国民经济的“上中游”。这就好比大江大河的治理,如果不上下游予以重点有效整治,而只盯着下游,那肯定是本末倒置。

步入新世纪以来,各级政府力量的主要积累源是什么?土地!如果没有政府直接参与或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就不可能迅速带动对上游行业及其产品的巨大需求,也就没有上游行业快速扩展,就不可能发生对自然资源、能源、环境的过度需求,也就

城镇土地国有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中国土地制度,最终促成了土地被地方政府实际“所有”,它使得连续从大幅房地产涨价中获得规模巨大、增长更快的“土地收益基金”的地方政府成了中央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最主要“障碍”。迄今为止,土地收益不列入“预算内”,因而不公开、不透明、不需“专款专用”、不需“财政审计”,这不仅意味着可以“自主使用”,甚至“随意使用”,更意味着可以随时拿来“搞政绩工程”,用于铺垫“官职上升”的“基石”。

不可能产生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及其对上下游的传递,价格普遍持续上扬的通胀压力也就不会发生,也就不会有什么以“收缩”为基础的宏观调控。

或许有人会说,政府财政收入越多,其力量就越大。的确,过去十年里,我们看到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以两位数甚至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但别忘了,各级政府的“久欠”也太多,仅仅是诸如看病、养老、上学等社会保障体系仍是覆盖有限,等着大量财政投入,更不用说还有日渐庞大的行政机关与人员队伍吞没着每年增加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所有这些开支都是列在“预算内”的。也就是说,尽管列在各级政府“预算内”的财政收入是以每年20%多的幅度增长,但没有哪一级政府会说自己的开支是宽裕的,“钱不够花”反而是“预算内序列”里的常用语。所以,仅由明白白列入“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与积累,是不会支撑起各级政府强大的直接产业投资能力的,何况“预算内收入”是由各个“科目”核定并需要公开的,地方“长官”们哪能“随意”自主运用啊!

土地收益可就大大不同了。城镇土地国有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中国土地制度,最终促成了土地被地方政府实际“所有”。这一结果,导致了地方政府最希望房地产价格上升,甚至有些当政者认为所“筑巢引凤”的房地产价格上升得不快便经济经济增长得不快。正是这股力量成了中央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最主要“障碍”。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从连续大幅房地产涨价中能获取规模巨大、增长更快的“土地收益基金”!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土地收益是不列入“预算内”的,因而不公开、不透明、不需“专款专用”、不需“财政审计”,这不仅意味着可以“自主使用”,甚至“随意使用”,更意味着可

■新垦地

# 祖布科夫引发俄罗斯新猜想

梁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博士,俄罗斯问题独立评论人

在今天的俄罗斯,据说有接近99%的人都看过N.V.电视台“寻找新普京”的节目。根据专家的分析 and 民意调查,这档节目已经为普京寻找了12名接班人,不过其中并没有新总理祖布科夫。这位在俄罗斯100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中只排名第84位的“无名小卒”,在杜马通过对他的提名后已经表示,不排除明年参加大选的可能。在俄罗斯高层,如此明确表达参选意愿的,也只有他一人。

普京眼下肯定在嘲笑所有那些有关他继承人的分析和预测,就像前政府高官、俄罗斯阿尔法银行第一副总裁希苏耶夫说的。现在谁还敢再预测什么,简直就像白痴,现在唯一知道俄罗斯政治下一步怎么走的是只有普京一人。

但媒体和政治评论家们并没有就此停止预测,目前在俄罗斯广为流传的关于普京交接政权的版本仍有五种。

第一种:祖布科夫-普京方案。由于普京已经明确表示不排除在2012年再次竞选总统的可能,因此,分析家们认为这一方案最为明朗:第一步,普京动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和影响力竭尽全力帮助新总理竞选2008年总统;第二步,祖布科夫获胜之后选择合适的时间以健康为由辞职,从而提前举行大选,而普京此时就能合法参加竞选,从而为他赢得又一个8年任期。当然,普京也可以等到祖布科夫完成第一个总统任期,到2012年再参加竞选,那时候他同样不受法律限制。

在短期内为祖布科夫造势。普京本人就是很好的例子,1999年夏天他被任命为总理时,支持率只有3%,但只过了短短8个月,到2000年3月他竞选总统时的支持率就飙升到60%。人们注意到,在黑海总统官邸的讲话中,普京表示可能的候选人将至少有五人,所有人的机会都是一样的,不过,他特别赞扬了新总理祖布科夫。

方案二:伊万诺夫。他被认为是克林姆林宫主人的最忠实拥趸,如果他接任,显然会毫无疑问地继续普京的施政方针。最近一年来,由于在媒体频频曝光,他在俄罗斯民众中的威望有了很大提高。普京突然任命祖布科夫,也许是在对两名被大家看好的接班人还没有做出最后决断,因而想再一段时间再说。但这一方案对于普京来说,很可能意味着他将要离开大政治舞台。俄罗斯商界推测,明年才55岁的普京,如果真退出政坛,可能去经济界担任重要职务,比如俄气公司总裁。

以普京的影响力,他在经济界也同样是顶级人物。莫斯科生意场上同样在流传着一则笑话:2008年8月17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报道,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能源汽车国防工业渔业农业集团主席普京会见俄罗斯总统。

祖布科夫被任命为总理后,伊万诺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是表现得相当自信,他认为杜马通过对祖布科夫的任命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梅德维捷夫则显得很谨慎,始终没有就此事发表过公开看法。

方案三:权力分割。祖布科夫虽然表示不排除明年参加总统竞选的可能,但在回答记者是否会加入统一俄罗斯党的问题时,他表示,“我是一个无党派人士。我会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府的工作上”。因此,也有分析家认为,祖布科夫不会真的去竞选总统,他将继续为新总统担任总理。而普京虽然离任,但将继续留在大政治的舞台,比如国家安全会议秘书,杜

马主席甚至名誉总统或最高法院,尽管现在的俄国政坛还没有这两个职务,但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认为,完全可以为普京专门设置,以便让普京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鉴于普京曾表示离任后可能会出任某个政党的领袖,也有许多人认为普京会出任俄罗斯最大的“统一党”主席职务,甚至还有人认为普京可能会组织一个反对党。不管怎么样,大多数俄国人都对普京离任感到难过,民意调查中46%的人认为俄国损失了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此外,有67%的人都希望普京即使离任仍然能够从事政治方面的工作,并且在其他位置也能像在总统位置上那样出色。

这一方案需要克林姆林宫改革现有政治体系,弱化总统权力而赋予总理更多的权力。不过,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俄罗斯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分割中央权力的传统,高层权力的分割很可能造成权力斗争的激化,从而导致国家的分裂或爆发内战。

方案四:普京选择某个不为人知的第三者作为继承人。但所有这些候选人都有一个共同问题:支持他们的选民实在是太少了。

方案五:还是普京。克林姆林宫利益集团围绕着力交接的斗争很可能无法达成最后的妥协,因为每一方都会将对对方推举出来的候选人的胜利看作是自身利益威胁的开始,而皆大欢喜的结果就是保持现状,况且这样的政治气氛,也有助于为普京第三次竞选而修改宪法。

也许不到明年3月总统选举结束那一刻,俄罗斯的2008猜想都不会有最终答案,但至少有一点现在是明确的,普京直接隶属于总统办公厅,因此,他的升职不能不令那些商业和政治记录不好的生意人头皮发麻。



■另眼相看

# 另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

黄湘源  
独立撰稿人, 现居深圳

这是一种在易中天那里找不到可比性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它正在成为一种值得引起重视的基金经理现象,但同挂印封金的关羽和不为曹操出一谋的徐庶是两种不同道德范畴的事。

从近四成的离职基金经理大多弃公投私来看,尽管由于缺乏必要的离任审计,人们无法知道他们在担任公职的时候为公募基金出的主意究竟有没有公私合营或者损公利私的成分,但没有一个有可能像徐庶一样的清清白白,则是可以肯定的。

一般为,人才激励机制上的差异是导致基金经理弃公投私的主要原因,这种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最终只说明了暂时的表面现象,未免有失偏颇。假如基金经理只是为了报酬上的差异而离职,那么,公募基金相应地提高那些有业绩记录的基金经理的报酬待遇,一切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呢?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区别,本来只是在于基金募集方式的不同,但是,在中国,由于政策上的偏差,人为地造成了合法非合法之分,在政策大力扶植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公募基金,客观上成为被寄托了政府信用的公信力载体。可惜的是,人们心目中的这种“公”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误解。实际上,公募基金是中国股市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畸形怪物。它的发行方式和资金来源虽然是市场化的,设立和发起人的形成却是由政府的认可为前提。公募基金的主要发起人和管理者大多是券商,而有资格发起基金的券商追溯其前世今生,大多不乏国有资本的身影。尽管券商本身经过一再的增资扩大大多是所有制构成相当复杂的混血儿,但特殊的历史渊源,不仅使券商而且也使公募基金被当成一种公权在管理,而且还在借这股东合法的公信力误导市场,公募基金这些年来在发行上的惊人业绩,不仅反映了投资者投资理念的变化,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反映了这个“公”字的误导作用。

一个“公”字,给公募基金带来了公有制体制在管理机制上的一些固有的缺陷,比如业绩与报酬的脱钩,人才激励机制的不足,等等。这就为在同样这些方面具有灵活性的私募基金提供了显示其优势的机会。同时,私募基金地位法律上的逐渐阳光化,也成就了其向公募基金大借东风的有利条件。有眼光的基金经理如果不是仅仅为了获取更丰厚的报酬而选择取舍,那么,

■说言论

# 港股直通车的通与不通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内地境内居民可直接投资港股的政策构想(港股直通车)出台后,因为各方对此举有许多不明之处,一时间疑虑乃至谣传纷至沓来,以至于有关部门不得不出来说话,说港股直通车会待完善规则后即行推出,目前相关细则正在制定中。

事实上,在我看来,港股直通车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革命之举,堪与2001年加入WTO,2005年人民币开始渐进升值相提并论。然而,无论是“入世”还是“升值”,现在看来都未尽善。WTO固然带来了中国在贸易和FDI准入上的全面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持续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却也使得资本在中国的权益日益彰显,尤其是国有资本大举回潮下“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色彩渐浓,民营资本以及普通民众的权益被忽视乃至边缘化,这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谐以及未来发展非常不好的一个趋势。而人民币渐进升值路线的确立虽然维护了贸易部门的利益并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同时却不免带来流动性严重过剩的烦扰。

现在,港股直通车又将启动,它又将通向何处呢?

从某些因素看,港股直通车的政策构想有其精明的地方。其一,从长远看,中国的资本管制迟早需要放松,人民币也迟早要成为可兑换的国际货币,以港股直通车试水符合改革的大方向。其二,中国宏观经济目前正饱受“流动性过剩”之苦,而外汇过剩成为流动性过剩的一大源,因此港股直通车正好可起北水南调、内外资引的“泄洪”效果,给可能走向过热的中国经济带来清凉。其三,从近期情况来看,由于美国次级债危机,港股深受其害,此举可谓在香港资本市场下了一场及时雨,时机把握相当好。其四,此举同时助香港和天津经济以一臂之力,并刺激上海经济进一步发挥潜力,更加平衡中国经济。

众所周知,近年来,香港经济与内地的许多城市尤其是与最强大的竞争者上海的进步相比相形见绌,而港沪两城市未来10年的竞争势必成为分水岭,胜出者将成为能与纽约、东京、伦敦相媲美的国际级大都会、大金融中心,其地位未来中国其他城市亦将难以撼动,而败者可能失去历史机会。在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之后,如何维护其进一步繁荣成为中央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而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类似于CEPA的思路,即通过给予香港相比于海外更多或更早的开放机会,使香港能够更好的融入内地经济,更多分享内地经济繁荣的机会,从而强化其竞争力。

珠三角、长三角相比,天津在中国内地经济板块中,始终有所不足,如果没有政府的外力作用,要想崛起为支撑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第二极,终究力不逮。把港股直通车的始发站设在天津,显然将直接刺激天津经济。虽然表面看,上海会因此失利,但上海的优势面太多,香港和天津的竞争,可以促使它更好发挥自身潜力。从区域竞争竞争的均势来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考虑得更多、更深、更全面一些,则港股直通车对于内地的体制改革和未来发展或许会有带来若干负面影响。

现在大家一般认同,贸易自由化可以先行,竞争的引入以及产权的变革可以随后跟进,而汇率自由浮动以及资本自由进出等国际金融层面的改革应该最后出台。因为国际金融层面的风险最大,对于经济健康以及金融监管的要求也最高,而经济的健康(不说单纯的快速增长)以及金融监管的完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最难的。所以,国际金融层面的改革需要放在最后,有如水利工程大功告成后的最后合龙或开闸放水,如果其他工程有所不足,贸然放水风险甚大。在此方面,亚洲金融危机的前车之鉴,不可不吸取。

在港股直通车方案构想中,居民投资港股在规模上将上不封顶,即不受内地当前个人年出境资金最多5万美元的外汇政策限制。此举实际上意味着相对于对内引进外资而言,内资对外输出之门已开。虽然在当前,由于沪深股市仍然有着极强的吸引力,现实上不太可能出现内资大举进军香港的可能性。然而,一旦内地资本市场或者经济有任何风吹草动,大量内资离境将对内地经济尤其是依然脆弱的金融造成致命影响,其风险远比总量上的数目字要难以预期。

港股直通车的矛头所指莫过于“泄洪”。然而,对于流动性过剩,笔者早就指出,中国的情形和当年日本并不相同,日本当年面临流动性过剩时,其经济现代化基本完成,过多的流动性直接导致泡沫经济。而中国目前人均收入依然是低水平,经济现代化远未完成,通过发展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化解泡沫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国内资本市场,加快金融业发展,充分利用流动性过剩的机遇实为更加重要的事情。当前,中国最稀缺的是公共保障,而发展公共保障最大的问题是政府资金不足,为什么不借沪深股市一路攀升之机减持国有股,以所获资金去建立社保体系呢?这既稀释泡沫又为未来发展夯实基础,难道不比将流动性往外引更加有利于国家?

目前政府试图引出流动性的做法与当年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而日本在上个世纪的失败是包括对美国投资失败,对东南亚投资失败以及泡沫崩溃这三大失败在内的总体失败,其中,仅对美投资的失败导致的损失即高达8000亿美元,相当于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之和。所以,相比对国内泡沫风险的担心,笔者更担心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以及港股直通车资金外引可能导致的风险。从汇金投资石看,这一风险是那样的现实。

笔者的初步结论就是,港股直通车方案缺乏对国家宏观经济的深刻认识,缺乏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变革的总体权衡,对其可能的负面效应,不能不审慎考虑。